

身份认同专题

# 原住民身份认同对玻利维亚 外交政策的影响

[芬兰] 萨卡里·林登

**内容提要：**2019年玻利维亚总统选举及其余波引发了政治紧张，由此隐约暴露出玻利维亚社会原住民和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悠久的民族界线，而且这种界线还对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本文的目标是研究民族因素和基于民族的身份认同在多大程度上、如何决定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本文首先介绍了身份认同的概念及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应用，阐述了玻利维亚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该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和现状。通过分析玻利维亚是否存在分裂国家认同的内部民族界线，以及这些民族界线是否形成了清晰可辨的独立外交思想，笔者发现玻利维亚的原住民民族性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科学分支中关于国家身份认同对国际体系中国家间互动的影响，以及国家身份认同与权力和利益的关系。玻利维亚的原住民和欧洲白人后裔间的内部分裂，与二战后出现的西方社会的统一性、吸引力和持久性问题有着明显的联系。“西方”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世界的影响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关键词：**玻利维亚 原住民 身份认同 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萨卡里·林登 (Sakari Linden)，芬兰文化和认同协会前主席，欧洲议会宪法委员会首席顾问。

**中图分类号：**D87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3) 04-0131-19

2005 年 12 月，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 Ayma）当选为玻利维亚第一位原住民总统。在其前两个任期内，该国经济年均增长 5%，远超地区平均水平，50 万人因此脱贫。莫拉莱斯将天然气和矿业收归国有，散富于民，并通过公投批准新宪法，宣布玻利维亚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世俗国家，由此提高了原住民的地位。此外，他改革外交政策，推动对外关系多元化，以切割之前同美国的结盟关系。

2019 年 10 月，莫拉莱斯第四次当选总统。然而，大选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莫拉莱斯被指控选举违规，被迫出走墨西哥避难。玻利维亚政治右翼利用美洲国家组织随后发布的调查报告，声称莫拉莱斯领先的 10 个百分点无效。但最初支持推翻莫拉莱斯总统的《纽约时报》承认，“对玻利维亚选举数据的细致研究表明，美国国家统计局最初关于操纵选举的分析和胁迫总统下台的举动是有缺陷的。”<sup>①</sup>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承认了自封的玻利维亚临时总统珍妮娜·阿涅斯（Jeanine Áñez）。阿涅斯政府随后宣布恢复同美国中断了 11 年的外交关系，并退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加入利马集团。

2019 年玻利维亚总统选举事件及其余波引发政治紧张，似乎由此暴露出玻利维亚社会原住民和白人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悠久的民族界线，而且这种界线还对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笔者由此提出了一个假设：即玻利维亚的民族界线与其争取外交路线的斗争具有关联性。基于此，本文的目标是研究民族因素和民族身份认同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决定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

## 一 学术研究中的身份认同

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涉及“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各有侧重，但无论是心理学和人类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抑或是相关交叉学科的研究，均存在大体一致的观点，即身份认同的相关基础理论及其外延虽然可以应用于个体，但在分析社会和群体问题时或可实现更多维度的分析层次。

---

<sup>①</sup> Anatoly Kurmanaev and María Silvia Trigo, “A Bitter Election. Accusations of Fraud. And Now Second Though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07/world/americas/bolivia-election-evo-morales.html>. [2021 - 07 - 12]

### （一）心理学和人类学中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的概念存在于诸多学科，比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身份”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idem*，意思是相同或同一性。一方面，它描述了与自己的同一性，即那些定义个体独特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它也指与特定他人的同一性，而这又意味着与其他人的差异。<sup>①</sup>

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体身份认同的观点。埃里克森认为，人类对自己的理解是具有特定属性的、稳定而连续的人格。<sup>②</sup>人又具有社会性，是由社会创造的，其人格受到形成共识的规范和价值观的约束。近来有人认为，个体和集体是身份认同的两个方面，对二者的研究需要结合起来。

集体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基于对“我们”和“他们”的看法的类别和分类问题。<sup>③</sup>社会心理学家证实，个体对共同群体成员身份的感知会增强合作的可能性。<sup>④</sup>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行为体的观感可以从对手变成朋友，反之亦然。行为体将这些观念内化于心，结果表明可以产生心理回报，当然也有物质利益，比如安全和福利。

除社会因素外，身份认同还包含非社会因素，这导致身份认同不能无限延展。体型、种族、民族、地理、传统和语言等就是非社会因素的身体特征，它们很难被改变。尽管身份认同容易被社会塑造，但它也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它们总是属于一种或几种模式，而模式不会轻易改变。

###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中的身份认同

政治学的诸分支学科多关注国家身份认同，最常见的研究是政党身份认同对选票的影响、国内和国际种族冲突的原因和补救，以及关于国家形态的看法。<sup>⑤</sup>建构主义者认为，政治身份认同受社会互动的影

---

<sup>①</sup> Peter Fiske and Martin Sökefeld, “Identity in Anthrop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Anthropology*, September 5, 2018.

<sup>②</sup> Erik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sup>③</sup> John C. Turner,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 – Concept: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 in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Vol. 2, 1985, p. 80.

<sup>④</sup> Michael Spirtas, “French Twist: French and British Nato Policies from 1949 to 1966”,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 303.

<sup>⑤</sup> Glenn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Introduction: Tracing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Foreign Policy”,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 18.

认为，政治身份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sup>①</sup> 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鲁珀特·威尔金森（Rupert Wilkinson）将国家认同简单地定义为“与其他人群相比，某一人群更经常或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个体个性和态度的特征”。学术作品中也有很多原生主义对身份认同的阐释。如威廉·布鲁姆认为，认同“是一种心理上的动态，但又有生物学根源”<sup>②</sup>。

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很少关注国际体系中国家身份认同的性质、原因和后果。<sup>③</sup>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行为体的自我认同与随后国家间的互动模式无关；只有当行为体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发生重大转移，国家间的互动模式才会产生变化。<sup>④</sup> 社会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介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潜在的折中思路，认为人类能动性有能力改变社会系统，但结构是真实存在的，且无可争议地制约着行为。因此，国际行为体的利益并不是客观或依结构决定的，而是与社会身份认同共同构成的。<sup>⑤</sup>

任何愿意回应现实主义者提出的挑战、并愿意证明国家身份认同之于国际关系的意义者，都必须提出感知和衡量国家身份认同的方法。将身份认同和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解释为什么特征相似的国家在相似情况下行事方式却有差异。<sup>⑥</sup> 内部分歧和不同的外交政策传统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有效例证。首先，国家安全取决于国家身份认同。内部凝聚力有助于对外部威胁作出有序且有效的反应，爱国主义现象由此产生。其次，国家必须区分“朋友”和“敌人”。共同的身份认同是联系国家与其盟友的纽带。<sup>⑦</sup> 保罗·柯沃特对身份认同的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进行了区分<sup>⑧</sup>，他提出身份认同的内部维度侧重于内部凝聚力及其如何展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而外部维度是指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独特性，其要处理的是民族国家的地位问题。身份认同的内

① Glenn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Introduction: Tracing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Foreign Policy",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 18.

② William Bloom, *Person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3.

③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June 1994, pp. 384-96.

④⑤ Rodney Bruce Hall, "Territorial and National Sovereigns: Sovereign Identity and Consequences for Security Policy",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 146, p. 147.

⑥ Glenn Chafetz,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Introduction: Tracing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on Foreign Policy",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 16.

⑦⑧ Paul A. Kowert, "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 1, p. 24.

外维度经常交织，它们的相互作用是理解本文主题的关键，即基于对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根源的内部理解而产生的民族认同对变化中的结盟模式的影响。

### （三）衡量身份认同影响的分析工具

迈克尔·斯皮塔斯通过衡量某个潜在群体和其他潜在群体内部分别感知到的身份认同的相似性，尝试将群体身份认同形成的概念应用于国际关系。他认为，产生群体身份认同的首要条件是可及性，即人们必须熟悉这种身份才能感受到认同<sup>①</sup>，对另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表明有一种共同的亲和感，而对过去和现在的共同威胁的感知也是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过程。<sup>②</sup>

约瑟夫·格里科引入了一个基于认知和形象的概念，以确定国家选择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影响因素。<sup>③</sup> 格里科表示，这取决于“伙伴在过去是盟友还是敌人，是否认为有共同的敌人，他们如何看待未来权力关系的轨迹，以及各种类型的影响力是否可以转换”。首先，对另一行为体是威胁还是机会的判断是任何其他国家形象的基础<sup>④</sup>。其次，其他国家展现出的相对权力差距会影响该国的选择。<sup>⑤</sup>最后，其他国家的形象也包括文化维度，它强调一国的战略选择也受到对其他行为体的文化和行为规范的判断的影响。<sup>⑥</sup>

## 二 原住民身份认同和玻利维亚外交政策的变化

正如其正式国名“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所展示的，多民族性长期在玻利维亚的国家身份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原住民问题，特别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土著主义”，长期对玻利维亚的内政特别是外交政策有着深远影响。

### （一）玻利维亚的内部民族界线

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从库斯科和亚松森抵达今天被称为“玻利维亚”的地区，此后该地区一直被西班牙统治。在殖民统治的大部分时期，玻利维亚被称为“上秘鲁”，由查尔卡斯检审庭管理。玻利维亚的独立战争始于

<sup>①②</sup> Michael Spirtas, “French Twist: French and British Nato Policies from 1949 to 1966”,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1998, pp. 304-305, p. 305.

<sup>③</sup> 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0-50.

<sup>④⑤⑥</sup>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1995, p. 425, p. 425, pp. 425-426.

1809年，在持续了16年后于1825年8月6日建立了以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的玻利维亚共和国。

19世纪初，当许多拉美国家摆脱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而独立时，作为新的政治时代主流思想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态才刚刚出现。<sup>①</sup>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sup>②</sup>，克里奥尔精英是拉美地区国家意识的先驱，这些精英特指作为欧洲殖民主义产物的美洲土生白人定居者。安德森表示，克里奥尔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去殖民化的美洲社会和文化，同时保留欧洲的价值观念和白人至上主义。他们主张的民族主义旨在对抗占据数量优势但处于从属地位的原住民、梅斯蒂索人和非洲裔人口的平等诉求，以及抵制欧洲人的蓄意压迫。

西蒙·玻利瓦尔在1822年曾表示，拉丁美洲的国家建设进程还未就绪，仍然需要在新独立的国家建立社会契约。<sup>③</sup> 国家的形成有赖于同质化，因此，关于拉美国家建设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阿根廷人多明戈·萨米恩托认为欧洲文化优越于原住民文化<sup>④</sup>；古巴诗人、作家和革命家何塞·马蒂虽然主张将原住民纳入国家建设进程，但却认为原住民无法自我管理，需要白人监护指导。<sup>⑤</sup>

20世纪初，拉美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改进”印第安人以使其融入现代社会。<sup>⑥</sup> 墨西哥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将混血（mestizaje，常指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种族和/或文化混合）作为现代民族身份认同、团结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意识形态。<sup>⑦</sup> 许多拉美国家也采用了这种观点。<sup>⑧</sup> 然而，正如人类学家彼得·韦德（Peter Wade）所认为的，混血未能统一民族国家，

---

① Jussi Pakkasvirta, *Nationalism and Continentalism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996, p. 24.

②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pp. 50–51.

③ John Lynch, *Simon Bolívar: A Life*, Bost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13.

④ Domingo Fausto Sarmiento, *Obras Completa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Luz del Día, 1956.

⑤ Sandra Vanessa Bernal Heredia, “The Third Nation: A Proj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Bolivia”, University of Miami, 2009, p. 15.

⑥ Ann Zulawski, *Hygiene and the ‘Indian Problem’: Ethnicity and Medicin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2.

⑦ José Vasconcelos and Didier Tisdell Jaén, *The Cosmic Race: A Bilingual Edition*, Baltimore: JGU Press, 1997.

⑧ Marilyn Grace Miller, *Rise and Fall of the Cosmic Race: The Cult of Mestizaje in Latin America*,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4, p. 44.

因为它仍将原住民和黑人排除在国家建设进程之外。<sup>①</sup>

因此,长期以来,拉美国家为打造同质化的国家认同,竭力阻止原住民和其他族裔群体保留他们的身份认同。纠正这种倾向的第一波尝试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土著主义(indigenismo),它主要是文学运动,但也是社会和政治运动;土著主义代表了非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问题”的表述,以及对印第安人权利和文化的质疑。<sup>②</sup>

土著主义最杰出的代表是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sup>③</sup>和秘鲁的马里亚特吉<sup>④</sup>。德拉托雷强调拉美地区的本土根源,以及原住民需要从精神上摆脱欧洲框架和规定的束缚。马里亚特吉则认为,对印第安人的压迫是社会经济问题,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和秘鲁农村未能克服封建主义残余造成的,这种观点不同于其他许多人将其归咎于印第安人被西方文化同化。<sup>⑤</sup>因此,虽然土著主义声称要述说原住民的困境,但它几乎仅局限于在拉丁美洲占主流的混血文化中。批评者认为土著主义使用并暗中主张主流语言和文化,反而排斥了那些它声称要代表的群体。<sup>⑥</sup>

作为对土著主义的回应,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印第安主义(indianismo)。它强调印第安文明的文化价值,将印第安文化与拉丁美洲民族社会的文化区分开来,且不打算维持或重建前哥伦布时期的模式。<sup>⑦</sup>桑德拉·伯纳尔·赫雷迪亚认为,“这场运动强调自决、自治、国际法中的民族权利,以及社群导向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民族国家在族群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

① Peter Wade, “Rethinking Mestizaje: Ideology and Lived Experience”,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No. 37, 2005, p. 240.

② Alexander S. Dawson, “From Models for the Nation to Model Citizens: Indigenismo and the ‘Revindication’ of the Mexican Indian, 1920–40”, i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0, 1998, p. 279.

③ Vi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What Is the A. P. R. A.?”, in *The Labour Monthly. A Magazin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Vol. 8, No. 12, December 1926, p. 756.

④ Ofelia Schutt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Liberation in Lat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Y, 1993.

⑤ Thomas Abercrombie, “To Be Indian: ‘Ethnic’ and ‘National’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Greg Urban and Joel Sherzer (eds.), *Nation–States and Indians in Latin America*,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p. 96.

⑥ Jorge Coronado, “Indigenismo: The 1920s and 1930s”, in *Science Encyclopedia –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3, 2009.

⑦ Alberto Bolívar, “Latin America’s Terrorist and Insurgent Groups: History and Statu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ima: Strategos Institute, 2006, p. 2.

的诉求。”<sup>①</sup>玻利维亚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作家福斯托·雷纳加的著作激励了拉美地区特别是玻利维亚此后几代的原住民领导人。雷纳加的印第安主义是一种反殖民、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原住民自身，而不是由非印第安人主导的国家政策。<sup>②</sup>

20世纪70年代，在玻利维亚高原上以艾马拉语为母语的社群中兴起了一场名为“卡塔里主义”（Katarismo）的原住民运动<sup>③</sup>，试图增强民族意识，恢复原住民传统，消除对原住民群体的经济和社会歧视。<sup>④</sup>哈维尔·桑吉内斯表示，卡塔里主义反对统一的国家模式，并首次明确了玻利维亚是一个文化和身份的“马赛克”。<sup>⑤</sup>

费利佩·奎斯佩（Felipe Quispe）被称为“马尔库”（在艾马拉语中指“秃鹫”或“最高社群领导者”），他是一位玻利维亚原住民领导人，因替原住民表达诉求而在玻利维亚高原地区颇负盛名和尊重。他支持原住民的排他性身份，甚至质疑玻利维亚有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存在。<sup>⑥</sup>此外，他还经常谴责白人“沐浴在土著人的血液中”，由此挑起民族对立。<sup>⑦</sup>奎斯佩的反西方情绪很强烈。1990年，他在入狱数月后，参与创建了一个名为图帕克·卡塔里游击队的暴力组织。该组织意在减少西方世界在玻利维亚的影响力，提高印第安原住民对国家的文化和优先日程的话语权。<sup>⑧</sup>奎斯佩否认玻利维亚国家和机构的存在，敦促艾马拉人从玻利维亚分离出来，重建可以通过以物易物实践社会主义的原住民社群，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国家。<sup>⑨</sup>

---

① Sandra Vanessa Bernal Heredia, “The Third Nation: A Proj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Bolivia”, University of Miami, 2009, p. 20.

② Fausto Reinaga, *La Revolución India*, La Paz: Partido Indio Boliviano, 1969, p. 463.

③ Fabiola Escárzaga, “Comunidad Indígena y Revolución en Bolivia: El Pensamiento Indianista - Katarista de Fausto Reinaga y Felipe Quispe”, en *Política y Cultura*, Vol. 37, 2012, pp. 185 - 210.

④ Raúl Madrid, “Politic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ndigenous Identity in Latin America: The Bolivian Case”,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2006, San Juan, Puerto Rico*, February 22, 2009, p. 12.

⑤ Javier Sanjinés C., “Mestizaje Upside down: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the Known”, in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Vol. 3, Issue 1, 2002, pp. 138 - 139.

⑥ Andrew Canessa, “Todos Somos Indígenas: Towards a New Language of National Political Identity”, e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25, No. 2, 2006, pp. 241 - 243.

⑦ Raúl L. Madrid, “The Rise of Ethno -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Bolivian Cas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6, Philadelphia*, February 5, 2009, p. 17.

⑧ Harvey W. Kushner, *Encyclopedia of Terrorism*, London: Sage, 2002, p. 368.

⑨ Andrew Canessa, “Todos Somos Indígenas: Towards a New Language of National Political Identity”, en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25, No. 2, 2006, pp. 241 - 243.



## (二) 玻利维亚原住民运动的政治参与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霸权在全世界蔓延,玻利维亚的原住民运动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强硬和消极的。拉美许多面临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得不实施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私有化、稳定宏观经济和贸易开放。债务危机迫使玻利维亚对水资源和天然气实行私有化,政府和经济精英为此与外国公司展开了谈判,而原住民、矿工、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体则奋力捍卫这些资源的国有化。<sup>①</sup>

原住民运动因反对新自由主义而与美国发生冲突。1985年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玻利维亚事务,作为接受美国和世界银行援助的前提条件,玻利维亚政府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1988年,美国推动玻利维亚政府通过了第1008号法令,迈出了在查帕雷地区根除古柯种植的重要一步。印第安人和其他运动组织发起了示威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借执行该项法律对查帕雷地区的军事化行为。<sup>②</sup>

2000年,科恰班巴市爆发了“水战争”,玻利维亚自此进入了一个持续的民众叛乱周期。这不仅是一场反对水资源私有化的群众暴动,也代表着民众对整个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广泛抗议。<sup>③</sup>2003年10月,群众暴动以“天然气战争”达到顶点,迫使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桑切斯总统出逃,其继任者卡洛斯·梅萨(Carlos Mesa)也因拒绝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决裂而被迫于2005年6月辞职。<sup>④</sup>

自2000年始,玻利维亚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为莫拉莱斯赢得了更多支持。2001年,莫拉莱斯成为反对美国在玻利维亚实施“尊严计划”的代表人物,这一计划旨在将古柯产量降至零<sup>⑤</sup>,而莫拉莱斯维护了在美国领导的“禁

<sup>①</sup> Sandra Vanessa Bernal Heredia, “The Third Nation: A Proj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Bolivia”, University of Miami, 2009, p. 29.

<sup>②</sup> Michelle Garza, “U. S. Drug and Coca Eradication Policies in Bolivia”, in *Revista Harvard Review of Latin America*, March 9, 2009.

<sup>③</sup> Luis A. Gómez, “Evo Morales Turns the Tide of History”, in Teo Ballvé and Vijay Prashad (eds.), *Dispatches from Latin America: On the Frontlines Against Neoliberalism*,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2006, p. 143.

<sup>④</sup> Newton Garve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ronting Evo Morales”, in *Counterpunch*, February 20, 2006.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6/02/20/th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confronting-evo-morales/>. [2009-03-09]

<sup>⑤</sup> Eduardo A. Gamarra, “Has Bolivia Won the War? Lessons from Plan Dignidad”, in *Confer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rug Industry at Utrecht University*, June 14, 2001, p. 2.

毒战争”中遭到残酷镇压的古柯种植农的利益。2005 年 12 月 18 日，莫拉莱斯以超过 54% 的得票率当选玻利维亚总统。<sup>①</sup>

费利佩·奎斯佩也是使得暴动成功的重要人物。在抗议活动中，奎斯佩一跃成为原住民农民运动的主要领袖。<sup>②</sup> 如果没有他的有效组织和广泛投入，抗议动员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地将两位总统赶下台。有意思的是，主要由奎斯佩领导的抗议和示威活动却给莫拉莱斯带来了支持和声望，使他在 2005 年当选总统。<sup>③</sup>

莫拉莱斯和奎斯佩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莫拉莱斯希望通过民主决策施加影响，并建立具有包容性的玻利维亚身份认同，而奎斯佩则选择了一条暴力攻击国家机关、种族排斥和分离主义的道路。然而正如伯纳尔所言，他们两人都是“拓展人类边界的思想家”（border thinkers）、知识分子，往来于优势社群和边缘社群之间，以期争取知识、经济和社会的解放。他们都拒绝单向的历史思维，而认同“印第安人理解”中的周期性历史。<sup>④</sup> 他们都想达到帕查库特克（Pachakuti，印加帝国君主）的高度，即重建或改造玻利维亚社会。<sup>⑤</sup> 这可被理解为“新的开始”“苏醒”“革命”或“革新”，或更广泛地理解为关于回归欧洲人征服原住民土地之前的旧时代的预言。<sup>⑥</sup>

### （三）2005 年之前玻利维亚的国际政治环境

1825 年之前，玻利维亚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玻关系对双方而言都很重要。西班牙和拉美国家的相互关系含有基于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特殊身份因素，而今则越来越多地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就本文主题来说，德尔阿雷纳提出的原住民身份认同的维度最近在某些拉美国家得到认可，他反

---

① Newton Garver,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onfronting Evo Morales”, in *Counterpunch*, February 20, 2006.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6/02/20/th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confronting-evo-morales/>. [2009-03-09]

② Clifford Krauss, “Bolivia Makes Key Concessions to Indians”, i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00. <http://www.nytimes.com/2000/10/07/world/>. [2009-03-05]

③④ Sandra Vanessa Bernal Heredia, “The Third Nation: A Proj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Bolivia”, University of Miami, 2009, p. 57-59, p. 61.

⑤ Felipe Quispe Huanca, *Tupak Katari Vive y Vuelve - Carajo*, Qullasuyu: Ediciones Pachakuti, 2007, p. 10; Eusebio Gironda, *El Pachakuti Andino: Transcendencia Historica de Evo Morales*, La Paz: EDOBOL, 2002.

⑥ Sandra Vanessa Bernal Heredia, “The Third Nation: A Proj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in Bolivia”, University of Miami, 2009, p. 63.

对基于共同的西班牙根源的伊比利亚—美洲身份认同。<sup>①</sup>

19 世纪初,美国通过排除或限制英国、法国、西班牙和俄国等欧洲竞争对手在美洲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试图提升其自身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是保护美洲新生共和国的内政不受欧洲干涉、扩大美国领土、为美国出口产品打开市场、保证航运中立的权利以及打击海盗。<sup>②</sup>美国在 1811 年 1 月颁布了所谓的《不转让决议》<sup>③</sup>,并于 1823 年发表了“门罗主义”宣言。随着国力增强,美国希望其外交政策和西半球霸权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愿景。从 20 世纪初开始,美国明确表示,为抵御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欧洲干预,美国有正当权利采取单边干预、军事占领以及将主权国家转变为政治和经济保护国等措施。1898 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摧毁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舰队并入侵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强国地位。

而西班牙由于自身影响力下降,不得不放弃对美国的遏制政策并转而与美国结盟。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然而,1947 年开始的冷战和美苏关系恶化却拯救了佛朗哥政权。<sup>④</sup>冷战时期,尤其是 1959 年古巴革命后,美国对拉丁美洲外交政策的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sup>⑤</sup>,以及尽可能地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sup>⑥</sup>,西班牙由此能够将大西班牙主义的理念与美国的反共利益联系起来。<sup>⑦</sup>

冷战初期,玻利维亚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由于经济衰退和不公正的半

---

① Celestino del Arenal, *Política Exterior de España y Relaciones con América Latina. Iberoamericanidad, Europeización y Atlantismo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Española*, Madrid: Fundación Carolina – Siglo XXI, 2011, p. 3.

② Brian Loveman,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July 7, 2016. <https://oxfordre.com/latinamericanhistory/view/10.1093/acrefore/9780199366439.001.0001>. [2021-06-27]

③ U. S. Congress, *No Transfer Resolution*, January 15, 1811.

④ Celestino del Arenal, *Política Exterior de España y Relaciones con América Latina. Iberoamericanidad, Europeización y Atlantismo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Española*, Madrid: Fundación Carolina – Siglo XXI, 2011, pp. 40-41.

⑤ Jorge I. Domínguez, “US – 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Working Paper No. 99-01,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January 1999, p. 4.

⑥ Hans Huber Abendroth,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los Estados Unidos Frente a Bolivia entre 1952 y 1978”, en *Revista Ciencia y Cultura*, Vol. 17, 2005, pp. 57-69.

⑦ Celestino del Arenal, *Política Exterior de España y Relaciones con América Latina. Iberoamericanidad, Europeización y Atlantismo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Española*, Madrid: Fundación Carolina – Siglo XXI, 2011, p. 45.

封建制度，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MNR）在革命中夺取了政权<sup>①</sup>，杜鲁门政府对玻利维亚革命政府持严肃保留意见，因为新政权政策的民族主义色彩非常强烈，坚决反对外国投资，且在20世纪40年代有反犹主义色彩。到1952年，虽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已不再强调其法西斯主义情绪，但其民族主义议程以及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仍令美国深感忧虑。<sup>②</sup>

威拉德—福斯特认为，美国之所以与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政府达成协议，不仅因为革命摧毁了玻利维亚军队的权力，还因为该政府将满足美国的要求，更因为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外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sup>③</sup>此外，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的领导人不但从未打算破坏市场经济以及打破与美国的依赖关系，埃斯登索罗总统还选择进一步加强玻利维亚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服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采取强有力的反共立场。<sup>④</sup>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计划以及外国经济和军事援助将拉美各国纳入美国主导的西半球集团。<sup>⑤</sup>美国对其南方邻国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迫使其采取新的政策立场，避免拉美国家政府奉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对西方跨国企业的利益构成威胁，更要避免其与左派联合的可能。<sup>⑥</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援助计划未能促进玻利维亚经济发展，反而破坏了经济多样化，加剧了社会经济不平等，巩固了城市白人精英的特权，而这些精英与印第安农村群众和城市工人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sup>⑦</sup>援助计划也没能保证玻利维亚的社会和政治安宁。因此，在雷内·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于1964年11月发动军事政变后，玻利维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专制资本主义。<sup>⑧</sup>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Alfredo Ovando Candía）上将参与了反对总统埃斯登索罗的政变。他将玻利维亚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废除了总统

---

①② Melissa Willard-Foster, "Chapter 4.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Bolivia and Guatemala, 1952-5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8, p. 124, pp. 124-125.

③ Melissa Willard-Foster,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Bolivia and Guatemala, 1952-54*,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8, p. 138.

④⑤⑥ Jon V. Kofas,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The IMF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Bolivia, 1956-1964", in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29, No. 2, January 1995, p. 2165, pp. 214-215, p. 215.

⑦ Susan Eckstein, *The Impact of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xico and Bolivia*, London: Sage, 1976, p. 33.

⑧ Jon V. Kofas,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The IMF and U. S. Foreign Policy in Bolivia, 1956-1964", in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29, No. 2, January 1995, pp. 215-229.

于 1955 年颁布的《石油天然气法》<sup>①</sup>，该法曾为玻利维亚引入能源领域的国际投资大开方便之门。虽然奥万多是反共的，但他的经济民族主义、公开的反美主义以及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做法极大地激怒了美国。

奥万多的继任者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é Torres）将军延续了奥万多的反帝国主义经济路线。在他的统治下，玻利维亚首次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并继续抵制美国的私人资本。托雷斯出生于科恰班巴一个贫穷的艾马拉—梅斯蒂索家庭，他在一场由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上校（Hugo Banzer Suárez）领导的、得到巴西军政权和美国支持的血腥政变中被推翻下台。巴西报纸《圣保罗州报》的一篇社论在政变前声称“如果玻利维亚的局势恶化，巴西很有能力承担起美洲大陆民主守护者的角色，并在必要时通过武力维护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根基”。这也是在西方文化领域，反奥万多政变之重要性的突出表现。<sup>②</sup>

班塞尔上校的独裁统治再次开始镇压工会和左派政党，并为外国资本大开方便之门。此外，班塞尔上校也为受玻利维亚前几届政府影响的北美公司提供赔偿。<sup>③</sup>从班塞尔上校开始，玻利维亚再次接受美国的影响，采取了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立场。<sup>④</sup>

#### （四）2005 年以来的玻利维亚外交政策路线

莫拉莱斯在 2005 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是玻利维亚社会政治史上的转折点。莫拉莱斯及其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结束了传统政党长达 20 年的统治。<sup>⑤</sup>莫拉莱斯的胜利引发了更广泛的、涉及多个层面的国家转型，例如重新定义以转变国家与外国投资关系为基础的新发展模式，以及从承认原住民集体权利开始的民族国家的转型计划。莫拉莱斯施政方针的三大支柱是土著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环保主义。<sup>⑥</sup>在担任总统期间，莫拉莱斯将一些产业收归国有，并颁布新宪法，承认原住民和农民的要求，呼吁给予原住

<sup>①</sup> “Bolivia, *Código de Hidrocarburos, DL N-4210*”, October 26, 1955. <https://www.lexivox.org/norms/BO-DL-4210.xhtml>. [2021-07-09]

<sup>②③</sup> Kenneth D. Lehman, *Boliv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Limited Partnership*,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9, p. 165, p. 67.

<sup>④</sup> Fernando Mayorga and Benjamín Rodríguez, “Nacionalismo e Indigenismo en el Gobierno del MAS”, en *Temas y Debates*, Vol. 20, No. 14, 2010, pp. 97-122.

<sup>⑤</sup> Natalia Ceppi,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Bolivia en Tiempos de Evo Morales Ayma”, en *Si Somos Americanos*, Vol. 14, No. 1, June 2014, p. 126.

<sup>⑥</sup> Luis Fernando Trejos Rosero, “Ejes Articuladores del Discurso Internacional del Presidente del Estado Plurinacional de Bolivia, Evo Morales Ayma”, en *Encrucijada Americana*, Vol. 5, No. 2, 2012, pp. 47-51.

民自治权。他还启用社会债券，意图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减少排斥和不平等。<sup>①</sup>

纳塔莉亚·塞皮曾撰文指出，莫拉莱斯从2006年开始重新设计了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加强了外交关系的多样性，并在世界舞台上保持了更引人注目和更有活力的形象。<sup>②</sup>在联合国，玻利维亚捍卫了原住民的集体权利，反对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要求取消对种植古柯叶的处罚。

在双边关系层面上，最重要的变化是推动玻利维亚与中国和伊朗成为合作伙伴：中国是商业上的伙伴，伊朗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伙伴。<sup>③</sup>莫拉莱斯认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外交政策，强调替代全球化并采用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叙事。<sup>④</sup>玻利维亚于2006年4月加入了查韦斯倡导成立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以此回应和抵制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美洲自由贸易区。<sup>⑤</sup>莫拉莱斯及其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政府的上台标志着玻利维亚和美国关系的明显转折，其反帝国主义和反霸权的言论以及加强与委内瑞拉和伊朗接触的做法引起了小布什政府的不信任，玻美关系因此变得敌对和冲突。<sup>⑥</sup>此外，德尔阿雷纳认为，玻利维亚政府一直有反西班牙的倾向，玻利维亚政府曾给西班牙公司贴上“新征服者”的标签<sup>⑦</sup>，并曾利用威胁西班牙投资作为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政治武器。<sup>⑧</sup>

德尔阿雷纳认为，玻利维亚一直是拉丁美洲新民粹主义潮流的一部分。重要的是，玻利维亚将原住民政策与新民粹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在拉丁美洲

---

①②③ Natalia Ceppi,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Bolivia en Tiempos de Evo Morales Ayma”, en *Si Somos Americanos*, Vol. 14, No. 1, June 2014, pp. 127 – 128, p. 138.

④ María Elena Lorenzini, “Las Estrategias de Inserción Internacional de Argentina, Chile y Venezuela: Primera Aproximación a un Análisis Comparado”, en *X Congreso Nacional y II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Ciencia Política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Facultad de Ciencia Polític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Rosario, 2012.

⑤ Manuel Canelas and Francisco Verdes, “La Nueva Política Exterior Boliviana (2005 – 2010): Más Autonomía y Nuevos Desafíos”, 2011.

⑥ “Evo Morales Declara Persona ‘Non Grata’ al Embajador de EEUU por ‘Dividir’ a Bolivia”, en *El Mundo*, September 11, 2008. <https://www.elmundo.es/elmundo/2008/09/10/internacional/1221081990.html>. [2022 – 02 – 07]

⑦⑧ Celestino del Arenal, *Política Exterior de España y Relaciones con América Latina. Iberoamericanidad, Europeización y Atlantismo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Española*, Madrid: Fundación Carolina – Siglo XXI, 2011, p. 146, p. 147.

的现实中引入了一个新的身份维度。<sup>①</sup>

### 三 原住民身份认同：一种影响玻利维亚外交政策的解释

关于原住民民族性对玻利维亚外交政策路线的影响，可以进行两个层面的分析：其一，玻利维亚是否存在分裂其国家身份认同的民族界线；其二，这些民族界线是否通过建立清晰可辨的独立外交政策学派以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按照保罗·柯沃特划定的界限，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就前者而言，问题在于玻利维亚内部是否存在程度显著的“同一性”，足以使该国内部保持高度的凝聚力；或者，该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关系紧张，足以导致国家和其不同民族在事实上不相容。就后者而言，问题在于两点：其一，原住民因素是否影响了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感知其群体成员身份的方式；其二，原住民因素是否区分了对玻利维亚的合作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

前文清楚地表明玻利维亚缺乏内部凝聚力。历史上，拉美的统治阶层就希望维系欧洲的价值观和白人的主导地位。原住民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玻利维亚社会之外。印第安主义和卡塔里主义试图使原住民成为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和自身利益的倡导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原住民与周围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进一步分离。奎斯佩甚至想通过强调他的反西方情绪、指责白人过去的暴行，以及通过否认玻利维亚国家的存在，加剧玻利维亚原住民和白人之间的冲突。奎斯佩还明确区分了原住民的文化和根植于欧洲的文化，并在事实上主张原住民文化的地位至高无上。

2005年，莫拉莱斯成为玻利维亚第一位原住民总统，他奉行的是具有包容性的民主道路，而奎斯佩选择的是武装抵抗、种族排斥和分离主义。尽管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也有相似之处。如前所述，奎斯佩在莫拉莱斯上台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们的目标都是解放玻利维亚原住民的思想、经济和社会，都希望重建玻利维亚社会以更好地适应原住民的世界观和需求。莫拉莱斯赞同奎斯佩的反西方和反新自由主义观点。作为总

---

<sup>①</sup> Celestino del Arenal, *Política Exterior de España y Relaciones con América Latina. Iberoamericanidad, Europeización y Atlantismo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Española*, Madrid: Fundación Carolina-Siglo XXI, 2011, p. 508.

统，他经常在口头上抨击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sup>①</sup>莫拉莱斯还提到过西班牙的入侵和对帝国主义的抵抗<sup>②</sup>，指责“帝国”在2019年11月发动的政变中迫使他下台。<sup>③</sup>

反西方和反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在莫拉莱斯的外交政策中显而易见。历届玻利维亚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片面强调与美国的关系，而莫拉莱斯的外交政策支柱之一是试图为新自由主义寻找替代解决方案，并推动玻利维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多样化。在他执政期间，玻利维亚改善了同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家的关系，反映了玻利维亚外交立场的变化。

莫拉莱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外国投资的立场是拉美左派政治势力的典型代表。阿尔坎塔拉和里瓦斯认为，如何认识美国的角色是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左翼政党对美国持更强的批判态度。<sup>④</sup>克雷亚祖认为，莫拉莱斯的外交政策与统治玻利维亚数十年的政治精英的利益相违背。<sup>⑤</sup>历史上，玻利维亚外交政策的特点是向美国的利益靠拢，只有短暂的关系紧张或保持距离的时期。莫拉莱斯的总统生涯明显标志着这一传统的断裂。<sup>⑥</sup>

对本文的研究问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决定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路线方面，民族性是比较左右政治划分更重要的因素。1952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领导了玻利维亚革命，这场革命被视为是基于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抗议活动。1953年，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推动实施土地改革法令，从官方表述中删除了所有关于“印第安人”、艾马拉人、克丘亚人和其他特定原住民身份的提法，并以“农民”一词取而代之。这一举动的目的是试图“改进”原住民，将他们视为农村地区的首要劳动者。<sup>⑦</sup>如前文所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利用本土因素的缺失，容许美国在该国的经济存在，并服从于美

① “Evo Morales Llama a Pueblos Indígenas a Combatir el Capitalismo y el Colonialismo”, en *El Comercial*, April 25, 2017. <https://www.elcomercio.com/actualidad/mundo>. [2022-02-07]

② “Evo Morales”, Twitter on December 27, 2020. <https://twitter.com/evoespueblo/status/1343185958368403456?s=19>. [2022-02-07]

③ “Evo Morales”, Twitter on October 20, 2020. <https://twitter.com/evoespueblo/status/1318602459242205185?s=19>. [2022-02-07]

④ Manuel Alcántara Saéz and Cristina Rivas, “The Left – Right Dimension in Latin America Party Politics”, in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Vol. 64, No. 235, 2019, pp. 353 – 393.

⑤⑥ Amaya Querejazu Escobari, “Indigeneidad en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Bolivia en el Gobierno de Evo Morales (2006 – 2014)”, en *Desafíos*, Vol. 27, No. 1, pp. 159 – 184, p. 170, p. 168.

⑦ Thomas Abercrombie, “To Be Indian: ‘Ethnic’ and ‘National’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Greg Urban and Joel Sherzer (eds.), *Nation – States and Indians in Latin America*,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p. 96.



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在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执政时期，玻利维亚依旧与美国保持着传统的亲密关系。

然而，本文研究的现象并不仅仅涉及南美洲的原住民，而是更广泛的以美洲为中心的身份认同，这与拉丁美洲的精英们经常持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身份认同相矛盾。例如，虽然查韦斯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原住民运动或族群，但他仍用严厉的言辞抨击欧洲在拉丁美洲的遗存。<sup>①</sup>此外，尽管莫拉莱斯继任者路易斯·阿尔塞（Luis Arce）来自非原住民的中产阶级，但他也受了莫拉莱斯关于多民族玻利维亚的思想。阿尔塞支持在玻利维亚和鲁纳苏尔地区重启其跨国项目<sup>②</sup>，捍卫玻利维亚的原住民符号<sup>③</sup>，呼吁实施《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sup>④</sup>，并通过与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一起纪念玛雅人反对征服者的胜利来表达以美洲为中心的共同的身份认同。<sup>⑤</sup>

建构主义者和原生主义者对行为体身份的来源意见不一。建构论者强调社会互动，原生主义者强调既定的、不可改变的构成。本文表明，玻利维亚内部有两条基于国家的民族—政治划分而产生的相互竞争的外交政策路线。民族性是身份认同的物理要素之一，且非常不易变化。在西班牙征服者到来近500年后，原住民终于在玻利维亚掌握了政治权力。在玻利维亚，对民族性的强调使原生主义者占了上风。按照威廉·布鲁姆划定的界限，可以认为玻利维亚外交政策分野的心理动因至少一定程度上是源于民族因素。

究竟在国家互动中自我认同重要还是只有权力重要，建构主义者和现实主义对此各执一词。莫拉莱斯上台后，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玻利维亚的情况不适用于身份认同研究中提出的关于政府官僚机构需要稳定预期的一般解释。在将莫拉莱斯赶下台后，玻利维亚的右派政治力量试图重返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结果第二年就不得不将权力交还给

<sup>①</sup> Clovaldo Hernández, “Chávez Equipara la Conquista de América con el Genocidio Nazi”, en *El País*, October 13, 2003. [https://elpais.com/diario/2003/10/13/internacional/1065996016\\_850215.html](https://elpais.com/diario/2003/10/13/internacional/1065996016_850215.html). [2022-02-07]

<sup>②</sup> “El MAS Reimpulsa su Proyecto Plurinacional para Bolivia y la Runasur para la Región”, en *La Diaria*, August 7, 2021. <https://ladiaria.com.uy/politica/articulo/2021/8>. [2022-02-07]

<sup>③</sup> Fernando Molina, “Un Incidente con la Bandera Indígena Agrava la Polarización Política Boliviana”, en *El País*, September 28, 2021.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21-09-28>. [2022-02-07]

<sup>④</sup> “Pdte. Boliviano Convoca a Implementar Derechos Indígenas Estipulados por la ONU”, en *TelesurTV*, March 25, 2021. <https://www.telesurtv.net/news>. [2022-02-07]

<sup>⑤</sup> Carmen Menéndez, “Arce y López Obrador Conmemoran Juntos Una Victoria Maya contra los Conquistadores”, en *Euronews*, March 26, 2021. <https://es.euronews.com/2021/03/26>. [2022-02-07]

路易斯·阿尔塞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一国之内存在相互竞争的外交政策流派已经证明，假设国家利益和偏好的现实主义立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从逻辑上讲，在玻利维亚和所有其他至少有两个外交政策流派的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必然不止一种。玻利维亚的案例支持建构主义关于国家间行动的观点。

正如前文所言，社会建构主义提供了一个介于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潜在的折中思路。可以看出，民族性显然对玻利维亚的外交政策路线具有影响。虽然这并非全部原因，例如莫拉莱斯的外交政策转向之所以可能，还受美国的外交政策专注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的行动影响。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玻利维亚的利益不是由客观或结构上决定的，而是与社会身份认同共同构成的。

在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玻利维亚新的外交政策路线明显与西方社会脱钩。在新形势下，由莫拉莱斯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所代表的左派和原住民倾向于与西方脱钩，而与北美和欧洲人拥有相同的传统和文化遗产、代表着右派利益的传统政治和经济精英则希望保持与西方社会的传统联系。从群体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2005 年后的新玻利维亚认为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巴西和阿根廷属于其“内群体”，而认为美国和智利属于“外群体”。玻利维亚右派将莫拉莱斯赶下台是试图让时间倒流，让美国和欧盟回到玻利维亚的“内群体”。

群体身份认同差异会导致对其他行为体形象的认知产生差异。首先，玻利维亚不同的民族政治群体以及基于这些群体的外交政策流派就某些行为体而言是威胁还是机遇的判断存在分歧。左派和原住民认为美国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愿意与玻利维亚的精英阶层接触，干涉该国内政，并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因此，它准备将中国、委内瑞拉和其他新盟友纳入其“内群体”。而右派和政治精英则将美国视为一个实现共同利益的机会，至少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扩大了其狭隘的阶级利益。

其次，另一个行为体与自身的相对权力的对比也是需要考虑的对象。玻利维亚的左派和原住民自然将美国视为一个更强大的行为体，因此具有威胁性。委内瑞拉和古巴的体量与玻利维亚更相似，意识形态也更兼容，因此被认为不构成威胁。中国虽然体量更大，但距离较远。与伊朗一样，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显然不认为中国像美国那样具有威胁性，因为中国不会干涉玻利维亚的内政，也不会玻利维亚推行新自由主义。从玻利维亚右派的角

度来看，尽管也认识到国家体量不同，但他们不像左派和原住民那样认为美国具有威胁性。因此，右派更愿意对美国采取绥靖政策。

最后，玻利维亚不同的民族政治群体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反应也不同。玻利维亚的右派对西班牙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精英特别感到文化亲近，对美国亦是如此。左派和原住民则不然。正如本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原住民的目标是减少西方文化在玻利维亚的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的印第安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他们认为自己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原住民具有文化亲近性。但他们并不觉得与中国具有文化亲近性，中国的作用更像是平衡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 四 结语

美国之于玻利维亚的左派和原住民而言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之于右派却是一个盟友。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美国和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在玻利维亚的左派和原住民眼中已完全失去了吸引力，但在主要由欧洲后裔构成的玻利维亚右派眼中魅力仍存。因此，不同民族性的增加，倒逼西方从某一地理区域退缩，地区均势由此发生变化，但欧洲血统在均势变化的压力下更有可能保持其影响范围。

玻利维亚是一个脱离西方影响范围的示范国家。随着一个统一的“西方”整体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sup>①</sup>，在玻利维亚的案例中，正是原住民的民族认同和反新自由主义情绪驱使玻利维亚不再维系与欧美权力中心的伙伴关系。与此类似的其他案例（如佩德罗·卡斯蒂略领导下的秘鲁），以及在地理、民族抑或其他方面不同的案例，都值得进一步研究。这些案例研究汇集在一起，就可呈现出一幅西方势力范围退缩的动态图。

（翻译 郭存海 王 越；责任编辑 黄 念）

---

<sup>①</sup> Vessela Tcherneva, “The End of the Concept of ‘the West’?”, in *ECFR Commentary*, May 18, 2018. [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the\\_west](https://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the_west). [2021-03-26]